

瓷海泛舟

——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

罗学正 罗丹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 PRESS

作者简介



罗学正，1942年生，江西吉安人，1967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现为景德镇学院教授，曾任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考古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景德镇陶瓷史学会副会长、唐英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古陶瓷研究、陶瓷美术创作及相关教学工作。其学术成果分别获省、市社科类一、二、三等奖多项。专著《陶林撷翠——中国古陶瓷史话百题》2002年在台湾出版。



罗丹，1975年生，江西吉安人，1997年毕业于景德镇学院美术系，现为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景德镇广播电视台《瓷艺景德》系列栏目执行主编、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主创的记录片《陶窑》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届法国陶瓷与玻璃艺术电影节”最佳文化遗产奖。陶瓷美术创作获国家级、省级奖励多项。

瓷海泛舟

——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

罗学正 罗丹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瓷海泛舟: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罗学正,罗丹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0.4

ISBN 978 - 7 - 5493 - 9838 - 6

I. ①瓷… II. ①罗… ②罗… III. ①陶瓷艺术—中国—文集 IV. ①J5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42835 号

| | |
|-------|--------------------------------------|
| 出版发行社 | 江西高校出版社 |
| 社址 |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
| 总编室电话 | (0791)88504319 |
| 销售电话 | (0791)88522516 |
| 网 址 | www.juacp.com |
| 印 刷 |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开 本 | 700mm × 1000mm 1/16 |
| 印 张 | 18.25 |
| 字 数 | 240 千字 |
| 版 次 |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93 - 9838 - 6 |
| 定 价 | 68.00 元 |

赣版权登字 - 07 - 2020 - 17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 - 88513257)退换

序一

己亥之春,罗学正先生将近40年来在海内外各种书刊上发表的陶瓷学术论文精选30余篇,准备结集成册,取书名为《瓷海泛舟——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并嘱我作序。回忆往昔似昨日,青丝已是白发人。想来都退休二十年了,他还心心念念地爬格子码字、留后世文章,其文可表,其善可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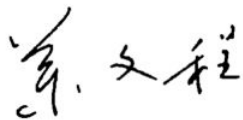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结缘于古陶瓷研究,那时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瓷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古陶瓷学会)每年都要在各地古陶瓷窑址所在地召开年会,有时还会组织一些专题研讨会。每次开会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和他为年会所撰写的学术论文,有的论文还被推选在大会宣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几十年间,他认认真真做学问,扎扎实实搞研究,跑全国各地窑口收集了不少古陶瓷标本,并做了大量分类、整理和研究工作,结合他在景德镇的对比仿制和古代工艺复原的实践,他的古陶瓷研究走出了新路子,也使得他的论文常有新依据、新视角、新观点。

罗学正历年所撰写的论文,除被学会刊发于年会专辑外,还广泛在各地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知识面广、信息量大,但重点还是立足于景德镇历代陶瓷的研究,涉及范围涵盖陶瓷考古学、陶瓷工艺学、陶瓷美学、陶瓷经济学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历史、宗教和民俗等,其中还包括景德镇明清官窑陶政和督陶官的研究、历代陶瓷文献的考证、古瓷与仿古瓷的真赝对比、陶瓷作坊文化以及对现代陶艺术家的创作鉴赏,等等。仔细研读不难看出,这些论文不仅有扎实的文献功底,还有丰富的考古资料相佐证,文笔流畅,逻辑性

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据我了解,罗学正在大学学的是陶瓷美术设计,而且一直从事陶瓷美术创作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虽不在文博单位供职,但对
中国陶瓷文化的研究却一以贯之,成绩斐然。退休后,他在景德镇
陶瓷大学担任硕导,还常在浙江大学及美国、新加坡等海内外知名
大学和相关团体做学术讲座,为弘扬和普及中国陶瓷文化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2002年,他在台湾五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专著
《陶林撷翠——中国古陶瓷史话百题》。该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
成为海内外陶瓷爱好者了解中国古代陶瓷的窗口,广受读者好评。
这次结集出版的论文集《瓷海泛舟——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
倾其一生的研究成果,广泛而多视角地深入探讨中国陶瓷发展进
程中的文化内涵,揭示其规律,尽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该书的
出版发行,必将给广大陶瓷爱好者和陶瓷文化学者以新的认知和启
示。



2019年3月12日

(叶文程,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现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

序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学院任教不久,在一次学校举办的自然辩证法学会研讨会上,在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从事古陶瓷研究的罗学正先生的一篇题为《景德镇陶瓷发展过程中若干问题的反思》的大会发言引起了我的关注。从此,我们由相识到相知。三十多年来,对他的学术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我心中有颇多感悟。最近,罗学正先生想将他历年撰写发表的学术论文精选三十余篇,作为景德镇学院的学术文库单独印发,取名《瓷海泛舟——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并嘱我为之写序。序者,引言也。因为对他比较了解,我也就却之不恭,欣然命笔。

罗学正先生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的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学的是陶瓷美术设计专业,陶瓷历史与陶瓷理论研究本来是他的副业。但是除了在陶瓷美术创作卓有成就外,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他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一是广泛阅读古代陶瓷历史文献,如20世纪80年代,他多次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查阅和复印了大量历史文献。同时,他还在北京、上海古旧书市场购置了相关的善本线装书。如十年前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主持编撰的《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中,他就提供了古版书目不下50种。他看古代文献,只信当时人说当时事,而对后人追述前朝的事,他绝不人云亦云,而是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证,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其严谨的治学精神的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坚持窑址考察和陶瓷实物标本研究,并将此作为古陶瓷研

究的重要手段之一。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景德镇市郊和市内古代窑址,他采集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标本。同时,他还利用参加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以及带学生外出毕业考察之机,调查了全国各地的古代窑址,深入了解了各地古窑的工艺特征和文化内涵及其与景德镇窑之间的关系。

三是利用仿古这一特殊手段,还原景德镇历代制瓷工艺和艺术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他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实物标本,研究试制了不同时代的接近实物的仿制品,深入了解了古代景德镇窑的生产面貌和产品特征,从而提高了古瓷断代与辨伪的准确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采用工艺痕迹鉴定古瓷的新理论。相关理论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新加坡及我国各类古瓷鉴定研修班的学术讲座中,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由于他的执着与勤奋,他在景德镇已成为少数几个老一辈古陶瓷研究专家之一,其学术水平在国内学术界也有口皆碑。

即将出版的《瓷海泛舟——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样稿,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内容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陶瓷工艺学、陶瓷美学、陶瓷经济学乃至宗教、民俗、戏曲等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世界陶瓷文化的视野下,他将重点立足于“瓷都”景德镇,每篇论文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和侧重点,无论篇幅长短,都经过了翔实的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绝无拾人牙慧之嫌。

几十年来,罗学正先生陆续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达数十篇,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网络上流传。数据显示,其论文的点击率和引用率都很高。这说明,他的论文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这次他将散见于各类书刊上的文章按发表顺序集中编印出版,不仅满足了广大陶瓷爱好者的需

要,也为后来的学者在从事陶瓷研究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其丰沛的学术内容将成为人们了解景德镇、了解中国陶瓷文化的一扇窗口。因此,其善可彰!



2019年3月14日

(陈雨前,景德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唐窑及其工艺技术成就研究 /001
- 浅谈景德镇窑仿钧 /033
- 景德镇早期白瓷向青白瓷过渡考略 /040
- 陶瓷仿古纵横谈 /050
- 略论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期间的戏曲创作 /059
- 景德镇陶瓷发展过程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073
- 论外来文化对中国陶瓷艺术的影响 /080
- 明清官窑陶政比较研究 /089
——兼论唐英的陶务政绩
- 青花瓷产生与发展规律探讨 /099
- 低温釉彩源流考 /108
- 学术研究中一块新开垦的处女地 /117
——读熊寥的“陶瓷美学”专著
- 试论欧美文化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影响 /120
- 关于景德镇“瓷都”地位的思考 /128
- 琉璃称谓考辨 /139
- 陶艺民族化的探索 /145

| | |
|--------------------|------|
| 景德镇唐瓷浅析 | /152 |
| 高岭游记 | /158 |
| 铁系高温釉瓷的瑰宝——天目瓷 | /163 |
| 青花料与青花绘制技法的演变 | /176 |
| 五彩、珐琅彩与粉彩源流考 | /180 |
| 景德镇明清官窑落选瓷的变卖与仿制 | /187 |
| 景德镇仿古瓷的历史与现状 | /193 |
| “谈虎色变”的仿古瓷 | /200 |
| 古瓷鉴定中的工艺痕迹辨识 | /203 |
| 元青花的真贋对比研究 | /207 |
|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 /217 |
| ——走进李林洪的现代陶瓷版画世界 | |
| 新加坡“林贤堂”所藏景德镇重工粉彩瓷 | /222 |
| 元青花的仿制与真伪鉴定 | /225 |
| 此“China”,非彼“昌南” | /233 |
| 景德镇陶瓷作坊文化 | /236 |
| 后记 | /281 |

唐窑及其工艺技术成就研究

中国瓷业发展到元、明时期,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则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了我国制瓷技艺的历史高峰,其中尤以雍正至乾隆早期最为优异。同时代人谓“厂窑至此,集大成矣”(《景德镇陶录》卷五)，“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古铜瓷器考》),就是对这段时间官窑成就的高度概括。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我国千百年制瓷技艺的经验积累,也是景德镇瓷工聪明才智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清廷所派杰出督陶官唐英所施行的陶政有着直接的联系。唐英是我国制瓷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窑务管理家和工艺实践家。他任期最长,成就最大。因此,研究唐英的窑务业绩,对于了解我国制瓷史上这段鼎盛时期的卓越成就和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一、关于唐窑的上、下限

陶瓷史上曾将雍正年间烧造的官窑称为“年窑”,而只将乾隆早期的官窑称“唐窑”。雍正御窑是否可称“年窑”?“唐窑”年限又是否仅限于乾隆早期?这些问题异议颇多,似有考证的必要。

(一) 雍正御窑是年窑,还是唐窑?

所谓“年窑”,史书上是指雍正四年至十三年(1726年—1735年)年希尧兼领窑务时的官窑生产。据《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年遐龄传》附《希尧传》介绍,年希尧于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因弟羹尧获罪革职。四年正月,授内务府总管,七月,命管理海关税务”,同时以内务府总管兼领窑务,“遥管厂事”。

从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查实,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以后,年希尧曾陆续接旨江西烧造各式瓷器。如“七月初九日,海望持出各色瓷碗二十七件、钟二十件、盘二十件、小碟六件、渣斗一件、小花瓶五件,奉旨:交年希尧做样用,钦此。于七月十二日将各色大小瓷器七十九件交年希尧家人郑旺持去讫”(《活计档》3301号)。但年希尧本人并未到镇,谁人驻厂监造亦不清楚。根据当时的情况,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郎窑”停烧以后,御窑厂一直没有恢

瓷海泛舟——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

002

复,其时宫廷所造之瓷很可能出于民窑,或系民窑白瓷在宫内加工彩绘。御窑厂于“雍正六年,复奉烧造”(《景德镇陶录》卷二《国朝御窑厂恭记》)。其时,唐英已驻厂督陶,“躬自指挥”,唐英撰《重修浮梁县志序》云“余自雍正六年,奉督陶之命,驻节邑之景德镇”(乾隆四十八年本《浮梁县志》)可证。可以说,雍正御窑厂恢复之日,已是唐英直接管理御窑厂窑务之时。年希尧系内务府总管,朝廷用瓷是通过他向唐英下达,“一岁之成,选择包匭,由江(九江)达淮(淮安)”,集中于年之“使院”,继之“转而贡诸内廷”(见《风火神庙碑记》)。御窑瓷器烧造系内务府管辖,年希尧行使的只是总管的权限,他的任务主要是向朝廷负责,史料中尚未发现关于他直接处理窑务的记载。作为康熙帝的宠臣之子,雍正帝的贵妃之兄,其纨绔子弟的“浮华”与“侈靡”处处表露,以致任期内曾遭到雍正帝的严厉警告:“朕论当谨志,毋忘‘侈靡’二字,尤宜切以为戒。”¹正因如此,年希尧无志于治陶,更谈不上有所作为。正如他在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中自供:“臣识陋才庸,即制造瓷器一事,不能殚智竭力,以至甚是不堪。”雍正帝即使有关怀之意,最后也多显示出无可奈何之状:“汝若竟安于下愚不移,则朕亦未之如之何也已。”²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他是不可能直接管理好窑务的。雍正帝一死,年希尧随即因“庇恶纵贪”受到弹劾而再度“鞫实削职”(《国朝耆献类徵·年遐龄传》附《希尧传》)。可以说,对于雍正官窑的生产,年希尧在任期内几乎难以顾及,也未曾实践任何陶务管理,如果仅仅因他兼领窑务而将雍正官窑冠之以“年窑”,那是名不副实的。

雍正官窑的真正督造者是唐英,《清档》和唐英的论著中提供的情况可以佐证。如“怡贤亲王口宣天语,命英监督江西窑务……一应工匠、商户造办、交易之事,靡不仰遵圣谕”(唐英《陶务叙略》),可见,唐英督理窑务是由皇帝亲自派遣的,其工作任务亦按“圣谕”办理,而且“一切烧造事宜,俱系奴才(唐英)经营”(雍正六年《唐英奏折》十六号)。因此,雍正御窑应该是唐窑而绝非“年窑”。《景德镇陶录》所谓“协理”“佐年”,纯由职衔、品级而论。“协理”前冠之以“驻厂”,正好说明雍正御窑的实际督造者是唐英而非年希尧。

(二)唐英在雍正年间的主要陶务活动

唐英自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赴镇“奉差督陶”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离镇接任淮关税务,“计躬亲其事者八载”(《重修浮梁县志序》),对景

德镇瓷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成绩卓著。

作为“幼即供役于养心殿二十余载”,雍正元年被“拔置郎署”,官居内务府员外郎的唐英,初到景德镇对于陶瓷生产“为有生所未经见”,凡瓷用原料、成型工艺、窑炉烧成乃至仿古创新、器型款式等,都“茫然不晓”,只能“日唯诺于工匠之意旨”而“惴惴焉”,但他肩负皇上亲授重任,深感“世受国恩”,“方恐报称无由”,“唯辱命误公之是惧”,加之他有一定的事业心和对陶务的浓厚兴趣,他没有游离于陶瓷生产之外,不甘“唯诺于工匠之意旨”,“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戮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到雍正九年,“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夫工匠矣。因于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³。为此,《清史稿·唐英传》对唐英给了很高的评价:“英……任事最久,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又能恤工慎帑……”用现在的话讲,唐英勇于实践,以求真知,变外行为内行,亲手掌握了造瓷规律,不断总结经验,革故鼎新。作为封建官僚,唐英确实难能可贵。这是唐英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使雍正官窑的烧造技艺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水平。对此,年希尧也做了充分的肯定:“越明年,而员外郎唐侯衔命来……工益举而制日精。”⁴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的《陶成纪事碑记》,全面、精确地记载了雍正御窑的烧造成就,不失为他的督陶业绩的纪实之作。若以督陶官的姓氏命名,雍正官窑堪称“唐窑”无疑。

(三) 乾隆早期唐英兼领窑务期间的业绩

乾隆元年至三年(1736年—1738年),唐英奉命榷淮,同时兼领窑务;乾隆四年(1739年)移调九江,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因病解任,中间除乾隆十五年至十七年(1750年—1752年)奉命移粤海关监督任职两年外,均于九江监督兼管窑务。这段时间,唐英虽仕途颠沛,但对景德镇御窑厂的生产管理仍起主导作用。下列事实表明,乾隆早期的官窑生产是在他的直接督理下并按他制定的规划进行的。

1. 榷淮三年,唐英虽不曾莅厂督陶,但经他奏准,解决了御窑厂的烧造经费⁵,维持了御窑厂烧造的正常进行;移调九江后,为解决经费“不敷所用”,又因经费“移淮请领”“远不及济”,唐英“再行奏请添支”,并要求由九江关就近

瓷海泛舟——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

004

发给。(见乾隆四年《唐英奏折》)

2. 为争取更多的时间驻厂“躬自指挥”。在淮安任上,他就以“瓷器制造不能兼顾”为由,要求“恩允奏请俾得专司窑务”(《唐英奏折》七号);移理九江后,又以“窑厂诸务”“承办有年,久所熟悉”为由,要求除三月间亲自在厂办理外,“拟于八月内届窑工正盛之时”,“再行赴厂以经理其事”(所引同上)。仅此还未达其愿,乾隆七年(1742年)又以每年两次赴厂督陶“道里往返,一年工作止得一两月监看,究不能逐件检点,殊非专一敬事之意”为由,“跪请圣慈俯准奴才(唐英)所请,另差管关之员”,“俟新差交待即前赴窑厂专司烧造……或于瓷务稍有裨益”(《唐英奏折》十二号)。但乾隆帝仅同意延长驻镇日期,因而,唐英不能如愿以偿。然而这种以陶成为己责、以督陶为己任、轻职位而重窑务的精神,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说明他对景德镇瓷业的高度重视和深厚感情。

3. 唐英在乾隆朝的任期内,有督造催总默尔森额,内务府员外郎六十三、协造员老格先后驻厂协理。对于这些同僚,唐英“将烧造一切事宜与伊细行讲究”,传授自己所掌握的制瓷知识和陶务经验,使他们很快达到“颇为熟谙”的程度。特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以后的老格,在他的耐心指导培养下,较全面地掌握了烧造知识和管理业务,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至于奏请破格留任⁶。就是在他移粤后接任的惠色,仍然全依仗老格维持陶务。(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唐英奏折》三号)

4. 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奉旨恭编《陶冶图编次》凡二十则,较完善、系统地总结了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科学地介绍了景德镇手工陶瓷生产的工艺技术操作,按成型方法分类,提出了景德镇瓷器分类法(圆器和琢器)。它不愧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陶瓷工艺学专著,不但对当时的景德镇陶瓷生产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一直沿用至今,为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提供了技术规范,使我国特有的传统制瓷技艺完整地继承下来。

5. 建立乾隆朝御窑厂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关档案中得知,乾隆十一年(1746年),唐英经内务府奏定,颁布了窑务《则例章程》,并要求长期遵照执行⁷,乃至唐英死后,其后任尤拔世仍在奏折中提到此制⁸,可见其影响之深远。遗憾的是,台北档案中未见其内容,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

档》中亦有待查实。如能找到,我们将对乾隆御窑的烧造规模、财经制度以及管理情况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以上事实表明,唐英在乾隆年间虽未专事窑务,但其政绩仍然卓著。因此,将乾隆年间的御窑命名为唐窑也是名副其实的。

综上所述,雍正御窑的实际督造者是唐英,所烧造的产品理应属于唐窑。作为遥领的年希尧,与唐英相比,其政绩是无法企及的。因此,陶书上介绍的所谓“雍正年年窑”的产品,实际上就是唐窑产品。而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36年—1756年)的官窑,唐英虽兼领窑务,但亲躬陶务,政绩显著,所烧造的产品属于唐窑也符合实际。

据此,本文关于唐窑成就的研究范围应是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28年—1756年)。

二、唐窑制瓷成就述略

唐窑制瓷成就,从传世的实物来看,制品胎质莹润,釉面质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造型品种繁多,圆、琢二器各式具备;制作手法精巧,装饰形式多样,釉上釉下彩绘,高低温色釉无不齐全媲美,仅雍正朝八九年间,即“仿古采今宜于大小盘碗盅碟瓶壘尊彝岁例贡御者”就有五十七种(《陶成纪事碑记》)。毋庸置疑,中国瓷器发展到唐窑,的确集历代制作之大成。

雍正年间的唐窑生产,时间不到十年,然其制瓷成就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质方面,唐窑能“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故“所造俱精莹纯全”;器型方面,则“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釉色方面,更是“仿古采今,诸色兼备”;装饰方面,除青花、五彩等传统产品大量仿制外,还发展了瓷胎画珐琅和后人所称之“粉彩”以及水墨彩等装饰品种。《陶成纪事碑记》在介绍仿制历代古名窑的釉色和装饰工艺的同时,还指出了新创制的以下品种:

法青釉(系新试配之釉,较霁青浓红深翠,无橘皮棕眼);

西洋色紫器皿;

抹银器皿;

彩水墨器皿;

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仿笔墨浓淡之意;

浇黄五彩器皿(此种系新试所得);

瓷海泛舟——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文选

006

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

新制仿乌金釉:黑地白花、黑地描金二种;

新制西洋乌金器皿;

新制抹金器皿。

可见,唐窑在雍正年间的制瓷成就主要在瓷质、彩绘和颜色釉方面。

到乾隆早期,上述成就虽得到继续发展,但主要贡献却在增加新品种和制作的精巧上。正如《旬雅》所云:“倡条冶叶,不乏奇丽之观。”《饮流斋说瓷》也认为这个时期的制瓷工艺“几乎鬼斧神工”。从文献记载和传世的乾隆早期产品看,传统的和新创的名贵色釉还在继续烧造,某些品种如“祭红”有新的发展;粉彩、青花、五彩等各种形式的釉上釉下装饰品种仍然大量生产,且“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都是“规抚名家,各有原本”,例如,山水画多宗董诰、张宗苍,婴戏图多本金廷标,花鸟则多据蒋廷锡、邹一桂,粉彩开光则从郎世宁法而出。装饰效果似有渐趋繁复之势,与造型渐趋新奇一脉相承。器型设计方面,从“古礼器、尊、壘、彝、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从仿战国时的金银错古铜器,到“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蠹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逼真传神。尤以转颈、转心等旋转瓶致为神妙,青花、粉彩、五彩、镂雕、刻印、捏塑以及窑温各不相同的颜色釉,集中于同一器物上,真可谓绝技。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清档·乾隆记事档》中就记载了乾隆皇帝要求烧造“斗龙舟打筋斗人转旋瓶”一事,这种双层转旋瓶本来就难烧造,还要加上斗龙舟和打筋斗人,新奇精巧熔于一炉,制瓷技术之高超可见一斑。

综观唐窑制瓷成就,就产品外观而言,无论仿古还是创新,都突出地表现在颜色釉的烧造和彩绘装饰方面。

(一) 各种颜色釉的成功烧造

作为官窑的唐窑产品,主要是满足宫廷奢侈生活的需要,因此,其款式品种多以清王朝贵族特别是皇帝的喜好为转移。《清档》中记录了大批皇帝御批钦定的瓷器款式,而且主要要求仿“内发旧器”。《竹园陶说》云:“雍窑珍品多仿古,当时由宫中发出古瓷甚多,交御器厂仿制,制作有本,故其出器甚精。”唐窑仿古除款式装饰外,主要成就还在颜色釉方面。远至宋代各地名窑,近至康